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05 年卷)

主　编　庞德谦

副主编　梁建邦　党大恩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4年卷/庞德谦主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24-07357-1

Ⅰ.司… Ⅱ.庞… Ⅲ.①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人物研究—2004—年鉴②史记—研究—2004—年鉴 Ⅳ.①K825.81-54②K204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276 号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5 年卷)

编 著 者 主 编 庞德谦
副主编 梁建邦 党大恩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渭南澄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6 开 11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7-2 2 4-0 7 3 5 7-1
定 价 .00 元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05年卷)编委会

顾　问：韩兆琦　张大可

主　任：庞德谦

副主任：梁建邦　党大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雅琴　韦爱萍　严安政　赵怀忠　庞德谦

党大恩　党艺峰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主　编：庞德谦

副主编：梁建邦　党大恩

目　　录

研究综述

司马迁研究综述 …… (1)
生平研究 …… (1)
学术思想研究 …… (3)
写作理念研究 …… (4)
人格研究 …… (5)
价值观研究 …… (7)
史学观研究 …… (9)
民族思想研究 …… (10)
经济学和社会理想研究 …… (12)
文学观研究 …… (14)
宗教、政治思想研究 …… (15)
其他研究 …… (16)
《史记》研究综述 …… (18)
文献考辨研究 …… (18)
体例研究 …… (23)
思想内容研究 …… (24)
人物形象研究 …… (25)
写作艺术研究 …… (32)
比较研究 …… (33)
《史记》与诗歌研究 …… (35)
史记学研究 …… (36)
近十年来《货殖列传》研究综述 …… (39)
研究概况 …… (39)
《货殖列传》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研究 …… (41)
研究特点 …… (43)
存在不足 …… (44)
司马迁、《史记》与韩城地方文化研究综述 …… (45)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 (45)
韩城司马迁学会及其突出的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成就 …… (46)
考古发现与研究
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 (49)
《史记》考古发现的研究 …… (56)
版本整理与研究
《史记》校读研究与史实考证 …… (69)
《史记》版本及注本研究 …… (80)
著作与论文摘要
研究著作与论文集 …… (83)
部分论文摘要 …… (86)
研究动态
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韩城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综述 …… (109)
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西安国际《史记》学术研讨会综述 …… (112)
韩城举行司马迁诞辰2150年“风追司马”活动 …… (116)
1993年吉林“全国《史记》文学及其教学学术研讨会” …… (119)
学术组织与专家
学术组织介绍 …… (123)
陕西师范大学史记研究中心 …… (123)
渭南师范学院史记研究所 …… (123)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 (124)
《史记》研究专家介绍 …… (126)
林聪舜教授 …… (126)
张新科教授 …… (127)
论文著作索引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05年） …… (131)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05年） …… (135)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文目录补遗（1994年—2004年） …… (137)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1949年—2004年） …… (147)
后　记 …… (17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司马迁研究综述

在 2005 年，围绕着纪念司马迁诞生 2150 周年这一主题，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韩城市人民政府以及多家新闻媒体展开一系列活动。在这种特殊的气氛中，对司马迁的生平、人格和学术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从整体上看，相关论文的数量在 100 篇左右，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个是在学术界已经卓然自成一家之言的学者对司马迁研究的投入，比如说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另一个是有一批青年学人集中精力置身于司马迁研究，比如说淮阴师范学院的张强博士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张克锋等。

如果对 100 篇左右论文的基本论题进行归类，我们可以发现，2005 年的司马迁研究涵盖司马迁生平、学术思想渊源、写作理念、人格、价值观、史学观、民族思想、经济学和社会理想、宗教和政治思想、文学观等方面。以下我们主要从十一个方面介绍 2005 年度的司马迁研究成果，同时对它们适当加以评论，以期能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参考。

一个伟大人物的生活史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不惟对现实中正在影响我们的那些人如此，对于历史人物也同样如此。但是司马迁的生平细节已经沉埋在时间的灰烬之中，所有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考察都带有假说的性质。在整个 2005 年里，关于司马迁生平考证的论文从数量上说并不算太少，比如施丁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史学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许勇强的《〈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补说献疑》（《晋阳学刊》2005 年第 4 期），王明信的《〈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及“会东从上来”之我见》（《龙门论坛》，华文出版社，2005 年），戚文《论司马迁冤狱》（《炎黄春秋》2005 年第 9 期）等。但是在所有严肃的考证背后往往都有一些其他因素起作用，从而无论研究的结论和涉及的论题都受到明显的限制。

《汉武大帝》在 2004 年岁末的热播至少在大众社会引发了一轮对西汉历史的热情。不可否认，为什么电视肥皂剧在当代中国会采用历史剧的形式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被学术界提出，所以也谈不上理解。但是，相关时段的历史往往会因此暂时成为已经几乎被忘却的某些学术问题重提的契机。在这种背景中，司马迁生平细节的考证难免带有偏见。比如说施丁的考据就有为了证明纪念司马迁诞生 2150 年的合理性的题外之旨。即使如此，施丁的论文依然是 2005 年最有价值的。

施丁是在司马迁生平考证方面用力最勤的资深学者，他的《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再次强调他一贯的结论，即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施丁首先回顾了考证这个问题的历史状况，他指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唐代学者司马贞于《自序·索隐》“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按，缺一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假定《博物志》“司马”下所缺的是“迁”字，而其下的“三年”又是元封三年的话，则可据此推断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 135）。然而，张守节于《正义·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注曰：“案迁年四十二岁。”按太初元年（前 104）迁

年四十二岁来推算，是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但此与《索隐》所注，相差十岁。王国维所著《太史公行年考》注意到了司马贞与张守节的两条注，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元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关于司马迁生年的一个新说》一文（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1968 年），提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不过为了使张守节说和自说一致，桑原氏"不得不把张守节的'四十'解说为'卅'之误"。由此看来，王氏、桑原氏之说都是有"弱点"的，两人最大的弱点是没有看清司马贞真正的错误。自从有关司马迁生年的两说提出之后，几十年间，很多学者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各持己见，互不信服。故司马迁生年问题，迄今仍是个悬案。在回顾问题的基础上，施丁强调考订司马迁的生年，还得再认真推敲上文提及的《索隐》和《正义》的两条注，而他的态度或者说立论的立场是对于《正义》"年四十二岁"是指太初元年司马迁的岁数深信不疑。论文中侧重展开的是《索隐》所引《博物志》的辨析，他指出，对于《索隐》引《博物志》注于《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以往有人（如张惟骧、王重九等）疑其有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博物志》的"三年"，是哪时的三年？它只是说"三年"，而没有年号，未标明元封三年。司马贞把它定为元封三年，只是个推测。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这个年号，在元封元年四月诏书上已定了下来。自此时起，凡是提到元封年号内的纪年，都是要书"元封"的。因此，《博物志》的"三年"本来就没有年号，司马贞将它引注于《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乃主观臆断，是错误的。二、《博物志》的"司马"之下夺了一字，此字是否"迁"字？有关《索隐》早期的版本，如南宋庆元黄善夫刊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元中统二年刊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以至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等，都是"司马□"，可见《索隐》所引《博物志》原来就是如此。如今有些《史记》三家注本刊为"司马迁"，可能是盲从于司马贞。为太史令者，不止司马迁一人，还有司马谈。《博物志》"司马"下的缺字未必是"迁"字；司马贞将"司马□"置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显然又是主观臆断，也欠妥当。《博物志》的"三年"，既不是《索隐》臆断的元封三年，那是哪个三年呢？施丁以为是汉武帝三年（即建元三年，前 138 年）。汉武帝登位初期，纪年如同以往诸帝纪年一样，以一、二、三、四为序，并无年号。到了元鼎年间，确定了元鼎年号，并对以往的纪年，追加了"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参见《史记·封禅书》）。故对于《博物志》的"三年"，应当推定为武帝三年。并应由此推断《博物志》"司马□"所缺之字为"谈"。在这里，施丁提出三点新的解释：（1）司马谈于武帝三年是否除官为太史令？据《自序》"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以及《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等记载，可以确定司马谈于武帝三年已为太史令。（2）司马谈此年是否已由夏阳迁至茂陵？据《汉书·武帝纪》，武帝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司马谈既已是太史丞的朝官，必定响应皇命而邀赏赐。由他老家夏阳至新邑茂陵，仅数百里之遥，道路较平坦，迁徙并不难。（3）汉武帝三年六月有无"乙卯"？据历学家研究，是年六月是己卯朔，无"乙卯"。疑《博物志》"乙卯"之"乙"，乃"己"之误。"乙"与"己"字形较似，在书写上是容易笔误的。总之，《博物志》"太史令"条，写的是汉武帝三年（即建元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只是"己卯"误为"乙卯"而已。弄出麻烦来的，是司马贞张冠李戴，将此条引注于《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由此可以推定《博物志》"太史令"条，写的是汉武帝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又可由此推知司马谈的生卒年（汉文帝十五年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前 165——前 110 年），还可确定《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之注本来无误，从而断定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 145）。

施丁的考证在逻辑上是严密而系统的，但是，整个逻辑推理的基础却是值得怀疑的，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对于《正义》"年四十二岁"是指太初元年司马迁的岁数深信不疑。也许，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司马迁生平考证的大多数学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施丁之外，值得注意的考证成果是何炳棣在回顾自己学术经历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重提“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的说法及其概略的论证。还有王子今的《论汉武帝三年太原之行》（《晋阳学刊》2005 年第 4 期）和《大汉·皇汉·强汉：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及其影响》（《南都学坛》2005 年第 6 期），论文都不是以司马迁为主题，而只是在与司马迁生平相关的某些外围区域展开。但是，何炳棣和王子今的文章明显呈示出一种方法论的启示。何炳棣和王子今具有明显不同的学术背景，但是他们的考据路数显示出的一致也许提示着一种方向，简单地说，他们把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引入考据。社会史的研究思路不仅要求历史真实，而且同时要求阐释的有效性。在司马迁生平的考据中，由于史料本身的缺乏，固然需要充分挖掘有限史料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更重要的是阐释的有效性。

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一直是整个《史记》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但是，它又是整个《史记》研究领域必要的基础。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原始察终——以考据为基础寻找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历史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另一个是思想体系构成的描述——提供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形态。在《史记》研究中，只有完成这一基础性工作，整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理据，同时保证所涉足的研究问题的有效性。近年以来，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虽然缓慢但逐步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以陈桐生等人为代表，为此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在这种前提下，2005 年成为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收获丰富的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强发表的系列成果，其中代表性论文有《司马迁的通变观和五德始终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论司马迁仁学思想的来源与帝王批判》（《苏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司马迁和〈春秋〉学之关系论》（《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司马迁与〈尚书〉之关系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 年第 4 期）。张强之外，陈桐生的《研究〈伍子胥列传〉的新资料》，张涛和董焱的《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陈曦的《〈伍子胥列传〉复仇意识探微》（以上均见《龙门论坛》）也是比较重要的成果。

张强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体现在他的《论司马迁仁学思想的来源与帝王批判》中。《史记》提供的历史谱系是以帝王为核心的，同时，司马迁具有明显的批判立场。这几乎是每一个研究《史记》的学者司空见惯的现象。张强正是从这里提出问题的。《论司马迁仁学思想的来源与帝王批判》的核心是帝王史观和帝王批判如何形成逻辑的互补。在张强的理解中，司马迁的帝王史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有德者居国的社会理想，王道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英雄史观和礼乐文化传统。在这里，张强和一般意义上的帝王史观形成明显的区别，其区别就在于张强所描述出的司马迁的帝王史观是在价值论上完成的，是具有理想性的。因此，张强强调《史记》“本纪”在全书体例系统中的纲领地位。对于张强来说，他所归纳的帝王史观和《史记》“本纪”叙述的实存的帝王谱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如何在逻辑上填补这个裂隙成为研究更深入的契机。在这里，张强借助对司马迁所背负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处境的细致剖析指出，孔子“仁学”从两个方面给司马迁提供了思想资源：首先，孔子“仁学”的基本内涵既包含个人道德自律，同时又和王道政治理想有关，它是孔子在《春秋》撰著过程中弘扬史官文化的思想背景；其次，在西汉初年的社会建构中，孔子“仁学”是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影响促使司马迁在孔子“仁学”的启迪下开拓出新型的史官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基本特点是用历史哲学做表达方式，以史述干预现实政治。因此，帝王批判成为司马迁所建立的史观的逻辑结果。张强在这里表达出他对司马迁学术思想整体结构的把握，而他的研究中，更具有特色的是对司马迁学术思想原始察终的观察。张强在司马迁学术思想的探源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视野的综合性，以《司马迁与〈尚书〉之关系考论》为例说明之。司马迁和《尚书》关系的清理需要对西汉中叶以前《尚书》的传承谱系做细致的分析，张强指

出，汉代《尚书》学分今古文，但今古文内部还有各种不同的流派，超出今古文之外还有其他流派存在。在文献学意义上，司马迁的《尚书》学吸收了今古文及以外其他流派的各种不同因素。这个结论的确平稳中庸，但张强由此引申出司马迁和《尚书》学更深入的联系，如他指出的，司马迁继承了《尚书》的文化品质，即隐蕴其中的宗教神学精神，同时《尚书》构成司马迁撰写上古史的着力点，特别是《书序》建立起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给司马迁以巨大的影响。整个论证过程充分显示出一种综合性的视野。

陈桐生的《研究〈伍子胥列传〉的新资料》是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陈桐生从《伍子胥列传》的复仇主题出发，重点在于提供新的材料。作为长期以来始终把研究重心放在司马迁学术思想上的学者，陈桐生能够因小见大，从微观把握宏观，直接走进学术前沿。复仇在当下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与政治哲学的崛起有关，同时它又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陈桐生在论文中没有过多地申述《伍子胥列传》复仇主题的表现形式，而是通过对复仇理念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演变的追踪把握《伍子胥列传》复仇主题的特殊性。《伍子胥列传》复仇主题的特殊性表现为陈桐生提出的问题：在复仇行为中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哪一个具有伦理价值的优先地位？这已经远远超出《伍子胥列传》的范围，是在司马迁学术思想整体、甚至是中国文化整体背景中提出的问题。陈桐生在对问题的解释中表现得非常克制，他提供了 1993 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两节文字，对文字本身进行疏证，最后得出结论，郭店楚简简文的基本精神是伦理内外有别，对内是仁，对外是义，在宗法血缘亲情的制约下，父子之亲高于君臣之义，亲亲重于尊尊，仁胜于义。而司马迁即使没有看到过郭店楚简简文，但他在叙述中明显将父子之亲置于君臣之义之上。陈桐生的论文虽然非常短，但是就涉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过程所显示的学风规范都和论文的篇幅成反比的。

2005 年的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无论从提出新问题的能力，还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看，与以前相比，应该说都呈现出新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方法的突破。长期以来，司马迁学术思想在方法上局限在考据、训诂等构成的朴学范畴内部。张强、陈桐生等人的研究工作一方面继承实事求是的学风，另一方面以学术视野的综合性和把握问题的姿态表现出把司马迁研究融入现代学术的期望，这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将具有方法上的启发。另一个是问题意识的现实针对性。正如张强在 2004 年底出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的“后记”中所说，“当改革开放面对西方的时候，当西方话语以咄咄逼人的势态成为霸权话语时，中国话语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能走向现代？这是我不得不关心、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种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对未来研究的启迪意义是巨大的。如果司马迁研究领域的学者有更多的人具有如此问题意识，司马迁研究也就能更快地融入当代学术主流。

的确，2005 年的司马迁学术思想研究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比如说某些研究依然在低水平重复，论文的数量也与研究对象的基础地位不相称，还有把研究论题庸俗化的倾向等等。

《史记》写作在司马迁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是最重要的一段，这个写作过程既是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史名著的诞生过程，也是一个人的诞生过程。简单地说，《史记》写作过程就是司马迁通过与古人的对话、交流完成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关注在 2005 年的司马迁研究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可永雪的《从关注“为人”到“心灵”的大师——司马迁对人心人性的探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和《从〈史记〉写人看司马迁对人的研究》（《龙门论坛》），潘定武的《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赖明德的《司马迁所体认之“苦闷的象征”》，梁建邦的《司马迁创作〈史记〉主旨的演变》（以上见《龙门论坛》），张克锋的《从〈史记〉看司马迁的辩证思维》（《甘肃理论学刊》2005 年第 4 期）等。其他相关论文还有何锦旭的

《试论司马迁的生平遭遇及其对写作〈史记〉的意义》（《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5 年第 10 期），刘凤泉的《论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思想》（《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张映梦《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等。

长期以来，可永雪孜孜于《史记》艺术美和文学成就的专题研究，他的《从关注“为人”到“心灵”的大师——司马迁对人心人性的探究》和另一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全部研究的一个总结，其立足点是司马迁“写人的自觉”和历史作为人的历史的自觉意识。在文章中，他把司马迁对人心人性的探究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个体心理的深层描写，另一个是对民族整体的心性气质的叙述。可永雪的文章保持了他一贯的注重实证的风格，不过分追求对结论的理性提炼，但其中显示出的研究旨趣和指向是非常有意义的。

潘定武的《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议》和赖明德的《司马迁所体认之“苦闷的象征”》从方法上看具有相同的趋向，他们不约而同以李陵之祸为核心，从创作心理学的一般描述入手，最终把握司马迁的主体形象。潘定武指出，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初，已经存在情感和理智的矛盾，而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来说，重要的是把他精神深处用冷静的睿智限制的情感充分地释放，正是因此，《史记》的创作过程首先是司马迁释放郁积的情感力量、净化自己灵魂的过程，但同时，司马迁的社会责任感、自觉的史家意识等理性思辨因素依然在起作用。这形成了《史记》文本的双重性质：既是一部实录式的社会史诗，又是一部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心灵史诗。最后，潘定武通过对司马迁“立名”观念的剖析指出，一个进取心强而命运受挫的人，必然时时幻想自己能够或应该成为某一种形象，这种理想化的形象往往已经变成一种潜意识，同时又渴望社会的认可，因此，司马迁高歌立功名者特别是自强者，菲薄尸位者和希世者，正因为前者叠映出其理想化的自我的种种特征，而后者又从反面给了作者以自豪。赖明德的论文展开的基础是两个概念：苦闷和象征。在他的理解中，苦闷就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它是人类精神力图突破困难以对周遭事物产生责任感的心理，它洋溢着刚健、进取、超越的特质，同时也充满前瞻性、开创性和奋斗性。而象征则是自我人格从忧患中提升自己到一种至大至刚的善美境界的著述活动及其结果。确立了解释的基础概念之后，赖明德开始分析李陵之祸背景中的司马迁的心境，他指出，李陵之祸中司马迁遭遇的矛盾是道德勇气和皇权专制的对立。因为个体做出良心的见证而遭受屈辱和摧折，所以司马迁突然陷入绝望的景况。但是，司马迁是一个具有道德勇气的人，一个对人类世界充满终极关怀的人，一个具有宗教家悲天悯人胸襟的人，因此，他能够从个体遭遇的凄苦困境凝聚、升华出如诗如画、可歌可泣的人生境界：“勇敢果决地面对困境，突破障碍，排除万难，以开创大局，引导苍生共创美丽的世界；将生命中的冰雪情操和对人类社会的无比宏愿，尽情地开发和展现出来；如冰雪上松柏一样，顶天立地，苍翠无比；亦如风雨中的鸡鸣一般，啼叫出亮光，啼叫出正义。”

如果说在一个具有独立文化传统的民族那里，一定会有一个思想家群体作为它的文化形象显示其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那么在构成华夏民族文化形象的思想家群体中，司马迁无疑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理解这样的思想家，不仅需要充分考虑他们的思想史意义，更需要全面深入地进入他们的人格世界。他们的人格世界往往能更感性、更直观地显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精神气质。

司马迁人格研究在现代是由李长之开拓出的一个论域，此后一直是整个《史记》研究的重心之一，但是在研究思路上始终没有能够从李长之所确立的起点做出更进一步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倒有向古典学术背景中的某些意趣靠拢的倾向。这就是缺乏对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的准确把握，因此，司马迁的人格被孤立起来，成为寄托研究者自身感慨的格式化的对象。2005 年的研究依然有绝大多数的论文没有超出原来的思路，比如说杨睿的《爱奇——司马迁独特的审美情怀》（《湖湘论坛》2005 年

第 4 期），崔荣华的《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张晶的《司马迁的人格魅力》（《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等。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一种新的迹象，李剑锋的《司马迁悲剧人格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是本年度最有意味的成果。李剑锋在他的论文中首先回顾了司马迁人格研究的历史状况，他指出，关于司马迁人格的光辉直至近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最先集中论述司马迁人格的是李长之，对司马迁人格的思想内涵、性格特点、朋友观念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使司马迁的人格形象清晰而生动地浮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开启了司马迁人格研究的先河。之后有关司马迁研究的两千多篇学术论文中，学者更加细致地关注到他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道德观、人生观、文学观、审美观、悲剧精神等多个侧面，就其人格的特性也多有涉及，但关于司马迁极富特色的人格却没有一个科学的术语予以固定。在清晰简明的学术史回顾中，李剑锋开始接续李长之的思路，他指出，李长之把“人格”理解成“精神宝藏”，认为“浪漫的自然主义”是司马迁人格最合适的称呼。但是所谓人格，不是人的各个方面的精神特质的简单相加，而是全部精神特质的稳定性指向，是通过个体自我言行举止和思想情感所表现出来的基质性、主导性精神特点。因此，说司马迁是“浪漫的自然主义”，虽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概括，但过于宽泛，也不足以揭示出司马迁精神中的主导性格。李剑锋从最基础的“正名”工作开始进入自己的研究，他用“悲剧人格”概括司马迁人格的典型性。在他的理解中，司马迁的悲剧人格的典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悲剧英雄。英雄所担当的都是超越一己之私，关乎群体、乃至道义的责任和事业，这样的责任和事业必然承载着民族和人类的共同文化理想，为了这一理想，英雄的心态是责无旁贷，可担当，担当之，不可担当亦担当之，如古人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其次，司马迁所遭遇的耻辱具有超出个体的意义，它是专制政治下一代士人的耻辱。而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它还是人类文化理想在特定阶段必然要蒙受的羞耻。但正是这种亘古稀有的强烈耻辱感成为司马迁探求洗雪耻辱的文化理想的动力，或者说强烈的耻辱感成为司马迁构建悲剧人格的人性基石，成为他恢复自我和人类尊严、促使人类走出专制制度和奴性文化所制造的耻辱时代的出发点。最后，在追问生命在世意义的过程不断挑战极限的发愤著述，这已经成为在耻辱中恢复生命尊严的一种富于悲剧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显示出顽强的文化再生能力和突破中庸精神的樊笼可能性，它所表现出的抗争、批判、叛逆性格，实质上是对独立自主、道义公正的渴望，它虽然被深埋在专制制度的磐石之下，两千多年来，却一直伸展着不屈的灵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李剑锋之外，2005 年专注于司马迁人格研究的是来自甘肃的青年学者张克锋，他连续发表《论司马迁的悲悯情怀》（《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从〈史记〉看司马迁的自由精神》（《青海师专学报》2005 年第 5 期）等多篇论文。在他的论文中，最好的是对司马迁的自由精神的把握。他指出，司马迁的自由精神表现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具有自由浪漫精神的人的热情赞扬。扬雄说司马迁“多爱、爱奇”得到后人的认同，而所谓“爱奇”其实质就是自由浪漫之精神。司马迁的爱奇，主要表现在对“奇人”，即具有自由、浪漫精神的人的倾心赞扬上。其次是对儒家繁文缛节的批判和对清静无为政治的推崇。第三是《史记》写法的多变，语言的不尽合规范和风格的奇逸。他说，《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的是独传，有的是两人合传，有的是数人列传，其中有六篇，《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严格地说并不是人物传记，而相当于民族史。还有一篇《货殖列传》是商贸史和人物传记的结合。在写法上，多采取客观叙述人物事迹，附以简短论赞的手法，但有些传记的议论抒情却占了很大的篇幅，与一般的写法迥异，如《伯夷列传》。钱钟书先生说：此篇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屈原列传》。《游侠列传》与之相类，也有大约 1/3 以上的篇幅是议论抒情。《史记》写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般突出写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但《管晏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篇却不记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事活动，而只记载了一些轶事，与其说是一篇人物传记，还不如说是一篇中心突出、寓意深远的小说。《司马相如列传》全文抄录司马相如的文章达七篇之多，占了全传 85% 以上的篇幅。《李斯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中选录的文章也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些都是突破一般传记的特殊写法。《日者列传》全文用赋法写成，《三王世家》就更为特殊，除了篇末的《太史公曰》外，司马迁再未发一言，全文只是编列疏、议、诏、策等公文书而成，与《史记》他篇迥然不同。《史记》在人物传记写法上的这些独特之处，表现了司马迁不守陈规、不拘一格、自由灵活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史记》惟不拘于史法，不拘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为文。《史记》的语言，确有许多不合当时和后代的语法及修辞习惯的地方。这些有点怪，甚或有些毛病的语言在司马迁的笔下被反复运用着，在表达人物神情和表达事物的情态上，又都起着一种分外绘形绘声、抒情达意的作用，它们像格律诗中的拗句，也有点像是交响曲里的不谐和音。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拗、这些不谐和才突出地呈现了它朴拙浑厚的独特风格。形式上的创造、创新也正是司马迁精神的特点，因为语言形式只不过是精神的外在表现而已。第四是舒愤懑的文学观。人的内在郁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发泄出去，就必然要通过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即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表达其心志，来发泄其怨怒。《史记》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舒愤懑之作。而所谓舒愤懑、发怨恨者，就是自由抒发情感的意思，所以说舒愤懑的文学观体现了司马迁的自由精神。如果把张克锋的相关文章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他对司马迁自由精神的把握同样继承了李长之的思路，与李剑锋不同的是他更重视人格和风格的内在贯通。因此，他侧重于分析《史记》写法和写作观念。也许在张克锋那里，重要的不是他已经获得的结论，而是在他的系列论文中引而不发的东西。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司马迁与孔子、墨子一样，有一颗伟大的爱人之心，他怀着普世之爱，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对人间的一切苦难和人生的种种悲剧，同情着、惋惜着、痛苦着，他不仅为受苦者、被害者、被压抑者、怀才不遇者、饮恨含冤者一掬同情之泪，也为那些残暴、昏庸、阴险、狡诈、贪婪、无耻、懦弱，欲害人而最终也躲不过悲惨命运的人深深地悲哀，他的爱是博大的，他的悲悯是深沉的，他的心中有着丰富的痛苦。而这才是司马迁自由精神以至于整个人格的基石。

司马迁价值观的研究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原因在于只有对司马迁价值观有深刻的把握才能更进一步理解司马迁对我们时代的意义。价值观是一个思想家的超越性的表现。但是，在这一论域里，研究思路始终有明显的局限性，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凭空立论，论题往往大而无当。2005 年度的论文依然表现出这种倾向，比如说刘国民的《论司马迁价值评价之片面性》（《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赵安启的《简论司马迁人生价值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梁安和的《试论司马迁人学思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等论文。在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向 2005 年度 8 月召开的“纪念司马迁诞辰 21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在司马迁价值观研究方面则呈现出新的气象，一篇是栾继生、李年群的《司马迁尚忠、崇孝、重义的精神品质》，另一篇是刘丽文的《司马迁与班固士道观的歧异及其成因》。

栾继生、李年群的《司马迁尚忠、崇孝、重义的精神品质》主要从传统价值观念和当代社会如何交互作用构成对司马迁价值观的影响和司马迁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两个方面立论。论文指出，司马迁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是忠、孝、义三者。家族传统和当代政治理念的结合形成司马迁的尚忠精神，而西汉初期倡导孝的浓厚风气培养起司马迁的尚孝精神，而尚义则是司马迁个性最突出的表现。从忠、孝、义等价值规范在司马迁那里的表现来看，它们既具有丰富的个性化内涵，又显示为司马迁个体行为结构的深层动机和个体作为。以下我们分别归纳文章对三个范畴的具体论述。忠在司马迁那里是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职

守三个方面内涵的融合，这种价值观成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要精神来源。他从自己作为史官的职业使命感出发，探究社会发展变化规律，讴歌进步的国家大一统趋势，把自己的忠诚渗透在具体的写作活动之中。孝相对于忠虽然内涵单纯，但影响于司马迁的精神则更深，是弥漫在司马迁心灵之中的一种更原始、更隐秘的动机。他对父亲临终场景的细节化描述，对家族传统的追溯，以至于遭遇李陵之祸以后的无颜面对先人丘墓的沉痛告白，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尚孝的精神取向，也是他隐忍苟活、发奋著述的原始动力。如果说忠孝显示出司马迁价值观的社会性的一面，那么义就侧重于个人化的一面。在司马迁那里，义既是侠义，也是情义，更是与道德理性相关的正义。司马迁在对游侠的叙述中，强调他们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写刺客，专心描画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敢“为知己者死”的一面。在写朋友交往，指斥势利交，歌颂那些“慕义无穷”的典范。而在自己的作为中为李陵辩护更体现出的是不抱私心以及对正义的追求。实际上，司马迁对义的理解和作为贯穿其中的反功利主义倾向，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在全面描述忠、孝、义在司马迁那里的观念内涵之后，论文强调司马迁的价值观是代表西汉时期主流思想的，其中凸显出的是时代性意义。而正是因为这种时代性意义才造就了作为伟大史学家的司马迁。当然，文章的最后结论或有可商榷的地方，西汉时期的思想主流不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需要做出细致分析。也许文章的不足就在这个地方。

刘丽文的《司马迁与班固士道观的歧异及其成因》在司马迁和班固士道观的比较中揭示司马迁士道观的具体内涵及其成因。从论文的结构去看，司马迁与班固的士道观是被分别论述、相互平行的，但是刘丽文在整个论述过程中暗示出的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立场。自觉的比较立场依赖于背景性描述，刘丽文给司马迁与班固士道观提供的背景是士阶层的起源及其演化。文章指出，士阶层的起源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社会破产的结果。战国时代，周王室的宗主地位在形式上也已经无法保持，权力空间多元化，因此，士无定主，君臣关系十分不稳定，往往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士人在这个时代获得相当自由的选择空间，从而就形成形式多样的价值实现方式，如论文具体描述出的，战国时代，士人有的以游说、干谒、推荐等多种方式进入权力空间，施展政治抱负；有的退守以保持轻富贵、傲王侯的高尚节操；有的以慷慨任侠、舍身报恩、重义轻生沉入民间；有的注重理论思辨，处士横议，建设安定天下的宏大叙事；也有赤裸裸的对富贵利禄的追求。在整体的历史回顾中，论文指出，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但却不属于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相反，他在精神上属于战国士人传统，这决定了司马迁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司马迁的价值观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立德是士人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一点具体体现在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上；立功是士人价值追求的另一重点，在这里充分展示出司马迁价值观念与战国士人群体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司马迁所理解的“功”的内涵的多样性上，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能兼顾道德和历史双重标准，从而显示出多种价值取向的交叉。司马迁在价值观上对战国士人群体的认同是时代的产物。论文指出，直到汉武帝前期，发端于春秋而蔚然于战国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士文化，在秦王朝短暂消歇，在西汉之初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恰好处于这个时代的结尾处。再加上个性因素，从而促使他的价值观成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语。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士道观及其价值取向是汉武帝之后全面推行儒学化和正统化的主流价值观的典型形态，其特点在于体制性和规范性。可以说，司马迁和班固士道观的歧异实际上是由时代差异引起的。而论文所显示出的自觉的比较立场就是强调价值观是历史性的，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这个地方，论文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对司马迁的价值观的研究不再是用当代的某些观念去强奸司马迁，不再是用研究者的既定思路去规范司马迁，而是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抱着同情了解的态度去认识。

与以往相比，2005 年对司马迁史学观念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不能说是多，但质量恐怕是空前的，朱维

争《历史观念论：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复旦学报》2005 年第 2 期），王成军的《司马迁和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人文杂志》2005 年第 5 期）和《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统一——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6 期）是最具有价值的论文。

朱维铮的论文保持了他一贯的从细微处做深度挖掘的方法和直逼本质的思维锐气。在论文中，朱维铮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一段话的作者归属问题开始。《扁鹊仓公列传》云："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长期以来，这段话被归属于传主扁鹊，被看作理解战国时代知识水平的一个标尺，但是，朱维铮从思想史的角度，借助于对文本的有效理解，指出这段话的作者是司马迁。在奠定文献学基础后，朱维铮开始考虑《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列传的整体编撰框架中的地位，借此理解司马迁的写作动机。他强调，《史记》列传的整体编撰框架所依赖的基本观念来自于荀子的"合群明分"，因此，《扁鹊仓公列传》的序次，被定位于田叔、刘濞二传中间，就不是随意的。田叔是汉初的三朝元老，曾被汉文帝称作"长者"，而他主要名声，来自调停汉景帝与同母弟梁王的紧张关系，以及出任鲁相，诱导鲁王改恶守法，是孔子所称"居其国必闻其政"的良吏楷模。同样，司马迁写刘濞传，也凸现这位早与景帝结怨而首倡起兵反对削藩的吴王，统治吴国数十年，"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实现了刘邦封他以求东南稳定的期望。但也因此使汉景帝感到他对君主集权的威胁，改变汉文帝的安抚政策。而且这位皇帝用人多疑，既从晁错建议下诏削藩，又与袁盎密谋杀晁错以图遏制吴楚诸侯联合造反。司马迁显然认为治国如同治病，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弃良医而信庸医，致使轻恙变重症，自招乱亡。他写田叔"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的故事，再写景帝用人多疑而终于激起诸侯造反乃至君位几失的故事，在二传之间忽然插入古近两位名医因医术高明反遭不幸的故事，序次编定的意味就在这里，简单说就是显示司马迁自己的"医国论"。朱维铮指出，司马迁的"医国论"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现实的和历史的。在现实层面上，朱维铮从"圣名史"出发论证"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中"圣人"只能是指汉武帝，因此，所谓"六不治"所描述的病相就是司马迁当代社会状况的隐喻。《扁鹊仓公列传》批判的对象，在于汉武帝君臣集团，认为他们均非医国手，并首列"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等作为病不可治的理由，意向非在治身，而在治国，强调"医之所病，病道少"。在历史层面，朱维铮从对《盐铁论》所描述的政治论争的分析开始，强调司马迁的"医国论"被普遍接受，但同时开始对其人格进行否定，而这种矛盾现象暗示出"医国论"已经被共名化了，在这以后，"医国论"观念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一种观念的历史形态转变成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观念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在身病和国病之间建立起一种类比关系。朱维铮在学术界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素有能做"诛心之论"的称号，他的结论往往深入骨髓，不仅文章题旨所关能转出新意，即使文章的细节也往往新意迭出。比如说，考证《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晚年忍诟含耻续写的《史记》名篇之一，再比如说考证司马迁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 90），其他的还有对大一统观念起源的思想史追踪等等。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研究论域的推广。在对《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中，他把对史学观念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足以启发此后的司马迁史学观念研究。

王成军在他的《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统一——司马迁与古希腊罗马史学观念之比较》中开宗明义，首先指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他说，在比较史学原理的指导下，把司马迁的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史学观念置于孔子"《春秋》之义"的史学体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的角度做纵向考察，以探讨其观念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将这种观念放置于西方古代最发达的希腊罗马的史学发展体系中，进行横向比较，了解司马迁史学观念的特点和深度。王成军指出，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的一个重大问

题，也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史开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有明显不同。古希腊罗马的两大史学流派各执一端，而由孔子《春秋》开启的中国史学则倾向于融合两者。虽然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对立的，但是无论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是孔子，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几乎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谓“《春秋》之义”实质是一种道德史学，由于缺乏超越性的立场，其主体无法从客体中分化，始终保持一种源初的同一性，而人的道德性只是对现实伦理纲常的肯定和内在追求，德性失去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强调道德性的外在性和条件性，或者从自然，或者从神那里寻找人的道德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中西方史学史一开始面临的困境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形成对人的本质的有效认识，特别是不能理解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从而道德标尺就失去和自由、尊严等等的联系。司马迁吸收了孔子的基本思路，但他的创造性一面在于能突破前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价值观念。司马迁道德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首先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正《易传》”、“究天人之际”，在天人矛盾中探求人的主体地位；其次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而由此形成他独具特色的史学范式。在王成军的理解中，司马迁所建立的史学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说，司马迁在《史记》中通古今、话今昔，深刻剖析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以求真，而同时在叙述历史因果关系时，又将每一个历史人物置于道德价值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以求善，从而能够在历史因果关系和价值判断冲突的前提下，褒贬并用，使得善恶昭彰，不因成败而湮没历史人物的道德价值。第二是在具体人物的叙述中，显示人的道德世界和行为世界的复杂性，形成善恶集于一身的人性形象。这种新的史学模式其核心是道德崇高感的显现，而具体的思想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司马迁在传统儒学内部增加了更多求真的因素，从而和具体的社会伦理秩序拉开距离，在道德主体及其客体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理性认知关系，同时在道德价值观念中更看重指斥和抗争现实纲常的精神气概，更看重虽九死而未悔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因此，整个历史显示出的是对道德崇高的自觉追求和社会实践。

2005 年刚一开始，湖北大学学报就组织了专栏文章，集中讨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在“编者按”中指出，《史记》中有六篇少数民族传记，其他某些篇章也涉及到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生活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时代的司马迁究竟持怎样的民族思想？他对汉武帝外伐四夷究竟抱怎样的态度？他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史？他对传统民族思想究竟有没有突破？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在《湖北大学学报》第一期的专栏文章中有韩兆琦《司马迁的民族观》、陈桐生的《司马迁有没有突破传统民族思想》、俞樟华的《司马迁论汉初民族政策的得失》和张新科的《〈史记〉民族列传的价值》等文章。从整体上看，这一组专栏文章的作者都是长期致力于《史记》研究的学者，文章的整体质量也相当高，而《湖北大学学报》的有意识策划形成的学术效应对扩大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响也是功不可没的。

韩兆琦的《司马迁的民族观》核心是论述司马迁民族观的进步性。他从两个方面去把握。首先是关于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的思想。司马迁在《史记》的少数民族列传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追溯它们的起源，而且每一民族的起源都可以从上古时期的五帝那里开始描述各自的谱系，因此，在司马迁的观念中，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都是同源的民族。在具体论述中，司马迁避免那些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表现出对兄弟民族的尊重。其次是同情弱小，反抗压迫、扩张、掠夺的思想。司马迁的这种观念体现在他对西汉的对外政策的具体褒贬中。西汉初期，因为奉行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在对外关系上也以和平共处为主导倾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国力越来越强盛，从汉武帝开始，拓展疆域的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司马迁在具体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显示出对前期政策的欣赏，而对扩张战争明显持有批判态度。

俞樟华的《司马迁论汉初民族政策的得失》集中考虑司马迁对西汉初期民族政策的叙述和评价。论文

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和亲和征战匈奴的得失，另一个是用人的得失。俞樟华全面回顾了西汉初年中原地区和匈奴的关系。他指出，匈奴和汉的矛盾始终存在，如何处理和面对匈奴取决于西汉国家内部的状况。因此，西汉初期的和亲是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的便宜之计，而在具体运用过程也总是一边和亲，一边备战。而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已经有能力用战争方式解决矛盾。司马迁在叙述西汉初年的民族政策时，虽然也指出征战匈奴的消极一面，但并没有否定这场战争本身，相反，在占主导性一面，司马迁是肯定这场战争的价值的。司马迁写事，往往更重视事中之人，他对汉武帝在汉匈战争中的用人也写其得失，从另一面也显示出司马迁民族政策的特点。总之，司马迁在对西汉初年民族政策叙述和评价中显示出自己的远见卓识，其民族思想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张新科的《〈史记〉民族列传的价值》从厘定《史记》民族列传的价值这种角度切入对司马迁民族思想进行把握。他提出《史记》民族列传的写作有五个方面的价值：一是体现出民族大一统思想；二是首创中华民族的完整谱系；三是丰富了历史叙述的内容；四是创立了新的历史编纂体例；五是保存了民族史的资料。文章最后强调，司马迁在叙述各民族历史时没有对周边民族的偏见，他的民族观念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促成大一统世界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陈桐生的《司马迁有没有突破传统民族思想》着眼于司马迁民族观的继承和创新。论文可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司马迁之前的传统民族观念的回顾和分析，另一个是具体理解司马迁民族观的继承和创新。陈桐生指出，传统民族思想包含在夷夏理论之中，而所谓夷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紧接着他从四个方面勾画出司马迁之前的传统民族观念的内涵，认为首先是夷夏理论生成的地理背景和基本文化内涵。他说，上古中国面对着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环境，东面和南面环海，西面和北面是草原沙漠，当时人们的世界地理知识就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以自己全部地理知识所及的范围为天下，天下分为夷夏，华夏因处于地理中心而称“中国”，四方分别是西戎、北狄、南蛮、东夷，“中国”较早地发展了礼义文化，因而对野蛮落后的夷狄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胜感。其次是包含在夷夏理论的政治理想，简单地说就是以中国天子为政治核心，形成一个中国履行抚夷之责，四夷对中国朝贡的政治文化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重德教感化的基本理念。第三是夷夏之辨和以夏攘夷。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一旦王室衰微，以王畿为中心的夷夏同心圆被打破，此时华夏民族就强调攘夷，以保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被落后的蛮夷文化所征服，由此形成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核心就是严夷夏之辨，不视夷狄为同类。最后，是夷夏观念在公羊学中的泛化。公羊家注意到春秋时期夷夏矛盾的新特点，一方面是某些夷狄邦国在交侵过程中接受了中国礼义，另一方面是诸夏不时丧失礼义立场，对此《春秋公羊传》采取了开放的心胸，提出了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而这正是是中国古代最为宽容的夷夏观。在对司马迁民族观念的论述中，陈桐生从两个方面着眼，认为不管是继承还是超越，都有时代因素在起作用。他指出，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夷夏之辨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汉武帝凭借汉初积蓄的巨大国力，发动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伐四夷的战争，司马迁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也曾经作为中央王朝的特使出使西南夷，对夷夏问题有着深切的感受。他在《史记》中为夷狄民族写了 6 篇传记，其他一些篇章也涉及到某些民族内容。其中《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汉家吞并周边小国的过程。传记所反映的夷夏矛盾表现为汉家要臣服羁縻周边蛮夷小国和蛮夷小国希望保持独立地位的矛盾，矛盾激化而导致汉家出兵，将这些蛮夷小国夷为汉家郡县，而司马迁始终站在汉家的立场上肯定蛮夷归附汉家，旗帜鲜明地反对蛮夷对中国的叛逆或离心倾向。这种以华夏为中心，肯定四夷归附汉家的思想倾向，没有超越传统的民族思想。但是，《匈奴列传》、《大宛列传》所写的是另一种情形，匈奴是汉家的劲敌，汉家倾全国之力伐胡几十年，虽然奠定了汉胜胡败的战略格局，但由于匈奴具有从大西北到中亚这一广阔的回旋余地，所以终汉武帝之世都未能实现臣服匈奴的战略目标，《匈奴列传》所写的就是汉胡关系史，重点是汉家伐胡。《大宛列传》

记载汉家经营西域的历史，汉家通西域虽出于消灭匈奴的战略需要，但其中也包含了汉武帝“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侈心。总之，这两篇传记真实地记录了汉家为伐胡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司马迁在《大宛列传》“论赞”中说，言九州山川当以《尚书·禹贡》为准，而不能相信《禹本纪》、《山海经》之类的小说家言，如果联系司马迁用相当多的篇幅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过度伐胡给汉家造成的重创，应该说，司马迁对中国天子的声威有没有边界问题已经有一些朦胧的感悟。

四位学者都是出身于古典文学专业的，走出专业限制，把握新的课题，的确是可喜的，但是，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从四位学者各自的选题和论述结构去看，只有陈桐生的论文做出了思想史的味道。也许，这给《史记》研究者的一个启发，面对《史记》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和司马迁这样一个思想巨人，必须不断拓宽知识视野，拓宽思维空间，才能真正把握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内涵。

2005 年的司马迁经济学思想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重视司马迁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性，另一个是把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加以理解。

司马迁经济学思想的时代性在相关的研究论文中获得比以往更宽泛的理解，既指出司马迁能立足于自己的时代理解经济现象，同时也指出司马迁对我们时代可能发挥的影响。丁光勋的《司马迁与时俯仰的经济观》（《学术月刊》2005 年第 1 期），韦苇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贫富莫夺”论及其对后代学者反抑兼并思想的影响》（《龙门论坛》）、崔凡芝的《司马迁工商业政策思想再探讨》（《龙门论坛》）、徐红的《司马迁义利思想浅析及对市场经济建设的借鉴》（《中国科技信息》2005 年第 16 期）等论文是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

丁光勋的《司马迁与时俯仰的经济观》是一篇全面理解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论文。文章从司马迁经济观的基本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和评价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司马迁经济观的基本内涵。他从四点描述，一是乐观时变，二是随时而逐利，三是逐时而居货，四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丁光勋所描绘司马迁经济观的四点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的理解，也就是所谓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他指出，西汉时期，在秦王朝所形成的密集的国家交通网络的基础上，由于城市空间的相对发展，形成了全国性市场，从而为工商业的发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就是具体的工商业经营理念。在这里“与时俯仰”成为关键，他强调，一个商人必须能及时观察市场行情，掌握供求规律，充分估计各种情况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工商业造成的连锁式影响，预测市场，以获取最大利润。而要达到这种目的，最重要的就是随时、逐时。随时就是能够根据市场行情不断改变营销策略，逐时就是及时倾销或者居货不出以待时。但是，随时、逐时都需要主体拥有某些内在的素质，这就是所谓智足以权变，勇足以决断，仁足以取予，强能有所守。其次是对司马迁经济观形成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丁光勋指出，西汉时期，各地区商品交换日趋活跃，促进了全国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商人资本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追求物质利益已经成为西汉社会的普遍心理。这三个方面是司马迁经济观形成的时代背景。第三，是如何评价司马迁的经济观。丁光勋在具体评价司马迁经济观的过程中，充分肯定司马迁经济观的理论创新，认为其既表现在司马迁能够在自己时代提供的条件下，认识了价值规律，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也表现在他用区别“本富”和“末富”回应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上。同时，丁光勋强调司马迁的经济观具有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对西汉时期所实施的国家干预政策的批判。当然，丁光勋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也对司马迁的经济观提出批评，他批评的基本理由是司马迁过分强烈的功利意识可能会导致忽略人的精神生活的引导作用，破坏既定的秩序，使人走向道德沦丧、惟利是图。丁光勋的论文在最后的批评性论述中暴露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渗透时代意识是否应该保持某种合理的边界，而丁光勋的不足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